

跨越式的发展。一直以来,珠海、澳门、中山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地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还没有完全上升到操作层面。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地缘人缘相近,是交流与合作非常有利的条件。增进三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香山文化研究是最好的桥梁与纽带。研究、传承和弘扬香山文化,不仅有利于今日三地的文化认同和资源共享,而且有利于促进广大海外香山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家乡、祖国的眷恋,强化香山文化、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三、结语

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文化大省,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中山率先提出研究香山文化,目的在于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世界潮流,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培育市民的家园意识和民族精神;加强珠海、澳门、中山的文化交流,有效地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实现多方面合作,从而使香山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促进资源共享、产业合作、文化创新与社会和谐;进一步丰富岭南文化,深化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识,拓宽岭南文化研究领域,繁荣中山市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文化大省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这些都是研究香山文化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王远明主编. 香山文化: 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2] 胡波. 香山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N]. 光明日报, 2006-06-01.
- [3] 胡波. 简论中山名人文化 [J]. 开放时代, 2005, (增刊).
- [4] 胡波主编. 人文香山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香山文化的现代诠释

胡 波

[摘要] 本文认为香山文化主要是指,以包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是中原土族移民入徙香山带来的汉族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并与西方文化交汇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保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并具有传承性、包容性、先导性和民生性等特点。

[关键词] 香山文化 地域文化 现代诠释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6-0115-07

一、引言

香山文化在地缘上主要指包括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地域文化。历史上中山、珠海、澳门同属于香山县。尽管澳门自葡萄牙人租占后,其本土文化增加了西方异质文化的成分,但总体上仍保持着香山本土文化的特征。珠海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从行政区划上从中山县分离出去,但珠海的社会民情风物仍不失乡土本色。自南宋绍兴二十二年香山建县以来,包括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县一直是一个整体,其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风貌也大同小异。它们有相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相对统一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独特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香山历史文化变迁经历了

作者简介 胡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社科部教授(广东 中山, 528402)。

唐、宋、元萌芽期，明、清积累期，近现代高潮期和当代发展期四个阶段。

从历史和现实上看，香山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它集中地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粤、闽和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是中原文化、土著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的产物，是相对岭南文化而言的亚文化。它既有所属的文化——岭南文化的文化特点、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又有其本身独具的特色，与母文化——岭南文化有所不同。香山的历史地理表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香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遭遇过多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融合，形成了一个兼容并包、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与岭南文化同步发展又在本质上与岭南文化具有同一性。从香山文化的生成、发展以及内容结构和性质特征上看，它又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缩影。

从文化形成的过程上看，香山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增量、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行政区划的多次变更而分散离析，相反，它伴随着香山经济社会的进步而得到传承和发展。从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香山文化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相互融合的产物。它既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古南越文化的特质，又打上了西方近代文化和南洋文化的烙印。方言文化、买办文化、华侨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名人文化等构成了近现代香山文化主体丰富多彩的画卷。发掘、保护、研究、开发、利用香山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方言文化

方言俚语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印证。错综复杂的方言，既是香山社会的一大特色，又是香山多元文化的一种表现。在香山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广东三大方言语系同时并存，且各大方言语系中又有区域间的不同。就今日的中山市而言，粤语系中分为石岐话、沙田话（近顺德话）、三角话（近东莞话）和古镇话（近新会话）；闽语系中也有三乡话、隆都话和张家边话之分。香山客家语系由于居民比较集中，语系内部比较一致，但与粤东客家语比较则存在一定的差别，因为它不仅受周边地区的三乡话、张家边和南朗话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西方近现代语言文化的冲击，言语之中夹杂了不少异质语言文化的内容。^{[1] (P1375-1403)}在珠海，同样是粤、客、闽三种方言并存，以粤方言为主。1953年后，随着非粤籍人员的大量流入，珠海地区出现了北方方言。其粤方言分布在香洲区、横琴区、万山区、平沙区、红旗区、三灶区和斗门县的大部分乡镇。根据其内部差异，又分为西北部地区粤音、南部地区粤音和水上门音三大类。客家方言分布在香洲区、三灶区和斗门县的部分乡镇，平沙区、红旗区和横琴区也有部分人操客家方言。闽方言主要分布在淇澳区、平沙区、香洲区和三灶区。方言种类的丰富性和集中分布的特点表明，香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和文化多元的社会。^{[2] (P975-991)}

语言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语言糅合在一起。香山自古以来接触的民族很多，像南洋、欧美和日本，以及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都和香山地域文化有过接触，语言中的借字借词借音的现象时有发生。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香山的方言中，借用英语词汇总数就在200个以上，闽南话、广府话和客家话也有彼此借字借词的现象。不同方言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构成香山独特的语言文化。香山方言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交错分布的特点，为人们了解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流变、传承、结构、特征、价值、意义等问题，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香山方言区域分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反映了香山文化的多元性和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潮，造就了香山社会结构的层级性和复杂性。据今中山市公安局户籍科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全市100多万人口中，有姓氏502个，超万人以上的大姓有26个。又据《香山县志》记载，中山闽语区的居民大部分是宋元之间从福建迁来香山的，中山客语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从粤东梅县客家话地区迁来的，而中山粤语区的沙田话居民则是来自番禺、南海和顺德等县，古镇话居民主要来自新会和江门市，三角话的居民大部分是近200年来由东莞县迁来定居的，操石岐话的居民主要是宋元之际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带迁来的中原人。民国时期出版的《香山县志续编》记载，珠海地区的唐、梁、容、杨、吴、陆、鲍、韦等主要姓氏，均系南宋宁宗开禧元年至度宗咸淳年间从南雄等地迁入。1990年人口普查时，

珠海有少数民族28个，姓氏365种，60多万人。他们大都按姓氏或宗族聚居在同一个村落或同一个乡镇，这一现象也说明香山移民大都是聚族而迁，在文化和社会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宗族性和家族性。

香山聚族而居和姓氏密聚的现象，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迁，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和有益的启示，因为它隐藏的是中国移民的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三、买办文化

所谓买办，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雇于外国在华商行并做其代理人的中国人。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帐房和银库保管员，而且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在商馆的商贸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后，当时的香山县出了不少在国内小有名气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据统计，1830-1900年的70余年内，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9/10，其中香山人的表现尤为突出。如唐廷枢一家三代都作买办，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唐绍仪都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他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其中属于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六家。^{[3](P2)}徐润也是著名的买办，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物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更是19世纪上海颇有影响的“地产大王”。^{[4](P1-41)}郑观应既是著名的买办，又是有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实业家。还有莫氏家族，也有不少人做了洋行买办，其中莫仕扬就是英商太古洋行香港总行的第一任买办，为太古洋行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祖孙三代历任洋行买办，其家族或亲戚充当太古洋行买办的累计达千人之众，员工中就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的话语，其财富达数十亿之多。^{[4](P366-368)}香山人活跃在19世纪的洋行，也表明香山人具有开放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格。

像徐润、唐廷枢、莫仕扬、郑观应他们这样在洋行或通商口岸做买办而发达的人，近代香山为数众多。在19世纪，“香山人”几乎与“买办”同义，香山也常被人称之为“买办的故乡”。19世纪50年代后，香山人纷纷迁移上海等中外通商口岸，成为洋行在通商口岸最出色也最信赖的买办和买办商人，尤其是刚刚开埠通商的海上海，香山人几乎在与外贸经营有关的领域，如洋行、商号、钱庄等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当时上海主要的洋行，如宝顺、怡和、琼记等的买办均是香山人。他们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从事着商业经营活动，为近代中外贸易和实业建设，甚至晚清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起到先驱者和创造者的积极作用。

买办和买办文化，是在社会发展变化时期，滋生于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带有间性特征的文化形式，是西方殖民地政策所造成的，通过不平等条约实现和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中西之间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买办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许多方面的社会影响，使之在历史效应上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人；另一方面它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文化现象和扭曲了的文化形态。它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过程的记载和标志。在它的表象之下积淀着的是近代中国那段痛苦的屈辱的历史，反映的是中西文化交汇时期的一种过渡现象。

四、华侨文化

香山是著名的侨乡，华侨文化成为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山华侨文化与其他地区的华侨文化相比，同样具有自己的特点。

香山人移居海外的历史，上溯南宋、下迄晚清。自香山立县至清末民初近800余年的时间，香山人绵延不断地向海外流动。据现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属于中山的华侨有约320383人，侨居于近80个国家和地区。珠海侨乡主要分布在唐家镇香洲区、前山镇、南屏镇、金鼎镇等镇区。唐家镇鸡山村现有人口600多人，而在三藩市的鸡山籍华侨华人却多达1000多人。香洲山场村的旅外乡亲是在乡人数的2倍。近现代包括中山、珠海在内的香山县因此成为著名的侨乡。

华侨虽然身在异域，却总是心系祖国和热爱家乡。他们不仅积极支持近现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而且关心祖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甚至直接参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

后，他们为家乡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出钱出力，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炽热的爱国热情，感人至深。

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香山人，从海外带回的不仅仅是大量的钱财，更重要的还有世界各国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思想、人文等方面的信息：一是他们把国外的思想观念带回家乡，使香山在许多方面得风气和开风气之先；二是他们把外国的科技运动项目和乐器传回家乡，促进了家乡技术进步和文体活动的发展；三是把侨居地的语言文化中的一些语词、语意等带回家乡，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侨乡“半唐番”的语言；四是他们把国外的一些动植物和商品带回香山，丰富了家乡人的物质生活。总之，他们以自己的言行，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和家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家乡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华侨对家乡香山的贡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侨汇。侨汇不仅成为早期香山人重要的生活保障，而且也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早期香山华侨汇款像其他地区一样，也主要是用来赡养家眷及作为自己的养老送终金。后来随着华侨逐渐融入侨居国主流社会之中，“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华侨汇款逐渐表现为较强的投资性和捐献性。他们有的在家乡买田建房，有的投资实业，有的捐资办学，有的捐献于慈善事业，有的直接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侨汇流动的方向可谓错综复杂。

虽然侨汇流动的方向千差万别，但对香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大都历史俱在。耸立在香山各大乡镇上的碉楼，虽然没有开平碉楼密聚和华丽，但它同样是香山华侨文化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沙涌、竹秀园、北台、南朗、沙溪、三乡等地，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清末民初华侨的建筑物，它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由此折射出当年香山华侨海外艰苦创业的历史和爱国爱乡的精神。他们回国回乡投资实业，助教助学，热心公益的义举，不仅促进了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而且也繁荣了祖国和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改变了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甚至催生出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和人生观与世界观，从总体上有力地加速了整个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步伐。

五、商业文化

香山人向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宋代香山立县以来的石岐，一直是各种商品的聚散地。元明时期，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澳门与香山地区之间的贸易就更加频繁。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定以后，香山因地近港、澳和广州，中外贸易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境内的石岐、小榄、前山、香洲等地，也因商业的繁荣而成集镇。特别是清末民初，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香山的工商业再一次出现蓬勃生机，县治石岐工商业在原来十八间商铺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虽屡经战乱，商贸活动受到影响，但民间墟市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对外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止，商贸传统因此也就传承下来。

大致说来，香山商业文化经历了宋、元孕育时期，明、清形成时期，清末民初发展时期，新中国以后转化和创新时期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宋、元孕育时期乏善可陈。明、清形成时期，因受颇具西方文化特色的澳门之影响，香山的对外贸易和内部商品流通日趋频繁，并逐渐形成了以中外商品集散地为主要特征的商业文化。清末民初，香山不仅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精通中外贸易业务的著名买办商人，而且也涌现出大批享誉中外的华侨资本家。他们不仅通过艰苦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和财富，而且也以他们的智识和勤奋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时为中山的商业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革新，石岐街的人文社会风貌也因此而改观。建国以后，中山的商业文化经过“三大改造”、十年“文革”和20多年改革开放的冲刷洗礼，经营方式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私营到公私并存、从单一向多元方向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经营理念也在过去的诚实、守信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诚信、公平、方便、快捷和文明、礼貌。中山商业文化因此也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具体说来，今日中山的商业文化集中地体现在早期中外贸易、买办群体和四大百货公司以及清末民初石岐孙文西路商业十八间等方面。受买办商人和早期中外贸易和中西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澳洲香

山华侨马应彪、郭乐兄弟、蔡昌兄弟以及李敏周和刘锡基，他们先后创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不仅把国外百货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经验、各国商品引进到中国，开创了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河，而且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百货业的现代化。

受买办和侨商的影响，清末民初香山商业文化，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均增添了不少新的色彩。尤其是香山石岐，以孙文西路十八间商铺为代表的市井商情最具魅力。它们既是传统商业在近代社会的延续，又是现代香山商业文化崛起的雏形。当时太平洋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汇丰公司、多多公司、昭信公司、福和盛、生发、宝昌、永安金铺、天宝、信发百货、满新、雨贞布匹、公益纸料行、亚细亚、德士古、美孚等十八间商业店铺的整体格局、店铺门面、室内陈设、经营范围、商品特色、商业用语、商贸活动、工艺制作、招幌市声、店员衣着和精神面貌，既有买办文化、侨商文化的烙印，又具有现代气息和时代特征。

近代，香山商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虽然略显短暂，但它在中国商贸史、特别是对外贸易史和商业文化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明末清初以来，香山因地近澳门而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在这一时期，中西洋的货物源源不断地从澳门经香山各地进入中国腹地，中国各地的产品又主要借助香山和澳门走向世界。石岐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迅速成为中外货物的集散地之一，其商业文化建设，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其次，买办、买办资本和买办文化，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而那时的香山却是大多数买办商人的故乡。尽管买办难免有崇洋媚外和惟利是图的缺陷，但是，他们中尤其是香山买办在早期中外贸易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上，毫无疑问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都生活在异地他乡，但是他们的言行和事业上的成就以及对家乡发展变化的关注和支持，影响了其时和后来中山人的价值取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时和当今中山商业文化的发展变化。

再次，香山侨商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不仅是华侨爱国爱乡的具体表现，更是中国百货发展史上的创举。他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东西方各国以商品为主要形式的物质文化，而且也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商业运作方式、管理哲学以及价值准则等商业文化方面的信息，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商业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最后，郑观应的“商战”论和孙中山的商贸观，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商业思想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多次强调振兴“商务”、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成为最早主张“商战”的思想家和最早介绍商会、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人。孙中山同样具有明确的重商思想，他不仅认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兼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而且认为士、农、工、商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无贵贱尊卑之别，中外通商，利国利民。他本人不仅与商会有频繁的接触，而且曾有经商的体验。石岐孙文西路中西药局，就是孙中山涉足商业的尝试。

总之，近现代香山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香山商业文化既是近代香山人自我价值实现的具体体现，又是中国近现代商业历史的缩影。香山人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汇的转折点上，借商业为入世之媒，大胆开拓、不断创新，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成功地实现了自我历史的书写。

六、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的文化事物和现象的总称，它包括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四个部分。

大致说来，香山的岁时民俗和红白喜事民俗与中原广大地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一些具体规定和仪式上略显不同而已。最能体现也最具审美和开发价值的香山民俗文化应是香山的民间文化艺

术。香山历来是民歌之乡，沙田地区流行的高棠歌、咸水歌和大罾歌，五桂山区客家山歌和白口莲、沙溪的鹤歌，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以咸水歌和高棠歌为代表的岭南水乡民歌民俗文化，最具艺术价值和开发意义。

另外，今日中山的民间艺术也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有舞龙、舞狮、舞鹤、飘色、放风筝、赛龙舟等，其中比较有名的为古镇的云龙，张溪的金龙和凤舞，牛起湾的金龙，沙溪的沙龙，申明亭的鹤舞，崖口、黄圃的飘色和麒麟舞。

放风筝和赛龙舟在香山古今都十分盛行，而且逐渐从民俗文化向全民体育娱乐文化方向转变。赛龙舟成了很好的一种文体竞技活动，成了人们蓬勃向上、奋发图强的一种精神展示。放风筝也不仅是一种艺术创新活动，而且还是一种社会交往、思想交流的契机。古老的民俗风情，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后，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小榄的菊花会和菊花戏，在中国民俗文化史、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民俗文化史上，均具有一定的地位，它们同样是香山民俗文化中的一支奇葩。持续了19年的慈善万人行，其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社会支持的公益性和民间文化艺术的表演性及其蕴涵的博爱人道精神，为海内外各界所称道。如今一年一度的慈善万人行，已经成为今日中山社会的新民俗。

七、名人文化

早在明代中期，香山文化教育就与中原等地的水平不相上下。嘉靖年间，科举人数日渐增多，中举人数达180之众，其中有16人考取进士，有的甚至后来在学问文章和官场上颇负盛名，如黄畿、黄佐父子。黄畿勤于著述，有粤洲先生之称；黄佐参加廷试，五试皆为第一。其著述甚丰，且被广为传诵，时人誉为奇才。还有明末官至内阁大学士、明亡后又被南明唐王召为首辅的何吾驺，以及何述玄等，均是当时的名士。到了清朝，香山人读书应试者众，在清初至科举制废除的200余年内，香山有2名探花，107名进士，721名举人，另外尚有贡生和监生589名。

与传统社会倾向于要求子女读书进学、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不同的是，香山人更多地倾向于工商和外出谋生。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香山人受东西方纷呈的文化影响，创业成材之路不再局限于科举一途，而是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不断进取，多途径多侧面全方位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杨仙逸、杨殷、林伟民、苏兆征等，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更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和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探索者。沈亚美、刘丽川、容星桥、徐振鹏、陈庆云、容有略等，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更是可歌可泣。孙眉、郑仲、唐雄、杨著昆、马应彪、郭乐、郭泉、蔡昌、蔡兴、刘锡基、李敏周、杨仙逸、鲍华、唐廷植等华侨，其积极投身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精神，为同胞所称道。徐润、唐廷枢、郑观应、马应彪、郭乐、蔡昌等，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工商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均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而容闳、郑观应、钟荣光、刘师复、杨匏安、王云五等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理念，既惊世骇俗、又前无古人。苏曼殊、阮玲玉、郑君里、萧友梅、吕文成、容国团、江嘉良等在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亦令今日中山人感到骄傲和自豪。郑藻如、唐绍仪、蔡廷干、梁如浩等在外交上表现出的才干和气节，同样可圈可点。卢慕贞、徐宗汉、梁定慧、董慧、徐慕兰、朱慕飞等也是名垂青史的巾帼英雄。在人口不到130万的香山县，短暂的民国时期居然涌现出近百名航空人员和3名航空学校校长，先后出现了唐国安、钟荣光、韦卓民、容启东等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历史人物都集中地出现在近代香山，实在不可思议。

一部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辞书《辞海》收录了古今中外2000名历史人物，有30余位香山人。《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收录的2353人中，香山籍的有188人，占总数的8%。在《中国近代史词典》中，收录的香山籍人物也近30人。在《中国现代史词典》中收录的1034人中，香山籍人物有15人，占总数的1.4%。

在《孙中山词典》收录的近800个中外历史人物中，香山籍有42人，占总数的5%。而载入其他典籍的香山历代名人亦不下300余人。在中国最早官派留美幼童120人中，香山籍就占了39位，约占总数的1/3。可以说，在近代中国，香山不仅产生了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而且还首开风气，创下了许多近代中国之最。^{[9] [7]}

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环境，孕育了无数英才俊彦，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其人数之众、知名度之高、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巨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历史并不悠久的香山，因有了这些革命家、改革家、外交家、思想家、实业家、文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科学家、军事将领和体坛精英，而闻名遐迩，誉满全球。

八、结语

尽管香山文化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但我们这里谈论的香山文化，显然不是那种包罗万象的混合物或集合体，而是指在香山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方言文化、买办文化、商业文化、华侨文化、民俗文化和名人文化等。它们既是香山文化的构成要素，又是香山文化的外在表征。

香山文化在长时期的交流、传承和变革的过程中，不仅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个性。

其一，香山文化具有传承性。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了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在发展变化中延续着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血脉。尤其是中山先生的愈挫愈奋、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和博爱精神，在香山代代相传和发扬光大。

其二，香山文化具有包容性。香山文化构成要素的复杂多样性，就充分显示了香山文化具有“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包容性。古今中外的雅俗文化不仅得到理解和接纳，而且还被转化和创新。香山文化实际上是多种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其三，香山文化具有先导性。明清以来，香山得风气之先，又首开风气。这里涌现出了许多领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体现了文化的先导性。

其四，香山文化具有民生性。香山人向来就有务实崇商、重义而不轻利的传统，香山的经济严格说来都属于民生经济，都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有关。香山的城镇甚至乡村，一是药店多，到处都有中西药铺，有凉茶铺，集市上有各种四时进补清火的药材，供家用煲汤配料。二是照相馆多，表明香山人有闲钱、有闲暇、有闲情、有闲心。可以说香山人实现了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的统一，他们的文化是民生性的或生活化的。

总之，香山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变化，以及内容结构、性质特征和功能作用，很难在此叙述详尽，但透过以上的分析和诠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香山文化主要是指，以包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是中原土族移民入徙香山带来的汉族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并与西方文化交汇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保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香山文化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移民文化，在本质上也是岭南文化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中山市方志办公室编. 中山市志(下)[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2] 珠海市地方志编委会编. 珠海市志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1.

[3] 汪敬虞. 唐廷枢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4] 徐矛主编. 中国十买办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5] 胡波主编. 人文香山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本栏责任编辑: 郭秀文